

# 反美主义语境中的中东民主化进程

王 健 汪舒明

**摘 要：**美国的“大中东民主改造”战略是基于反恐和国家安全的现实主义考虑，而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则源自现代化与全球化负面影响和美国偏袒以色列的不公正中东政策。在反美主义语境下推进中东民主化进程，必然会遭到阻碍和扭曲。反美主义使中东缺失民主化进程的稳定环境，限制甚至阻止美国进一步推动民主的决心，成为阿拉伯世界威权政府对抗美国民主化压力的制衡手段，甚至还会制约美国“大中东民主改造”战略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反美主义；中东；民主化

**作者简介：**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东室副研究员（上海 200020）；

汪舒明，上海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东室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20）

文章编号：1673 - 5161 (2007) 06 - 0039 - 07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 一、美国中东“民主改造战略”的动因

在全球扩展民主是20世纪以来美国外交的一项重要议题，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美国自视为“世界灯塔”和“山颠之城”，但在冷战时期美苏争霸中获得中东国家支持以及为维护其中东战略利益、防止反美伊斯兰激进势力借民主进程上台，“9·11”前美国则对中东民主发展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改造路径，与一些君主制和威权主义国家建立了良好关系，对其内部民主诉求不仅不予响应和支持，反而加以镇压。如1992年，美国害怕伊斯兰运动掌权，当“伊斯兰拯救阵线”即将通过选举在阿尔及利亚上台执政时，支持阿军方发动政变，强行中止该国民主选举进程。这种现实主义中东民主政策的理论解释就是所谓的中东“民主例外论”，即民主与中东无涉，崇尚真主的伊斯兰教与世俗民主不相容。美著名中东问题专家伯纳德·路易斯指出：“从政治视角看，伊斯兰教似乎为自由民主政体展示了最黯淡的前景”<sup>[1]54</sup>。而劳瑞·米尔劳伊则认为，在伊斯兰传统中，“政治和宗教的权威合为一体”，“主权在神”而非“主权在民”，自由民主与伊斯兰传统“完全不相适应”<sup>[2]</sup>。

“9·11”事件成为美国中东民主政策的转折点。重创之下的美国不仅开始重新审视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且逐渐把反美主义和恐怖主义根源追溯到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内部的“民主缺失”（Democracy Deficit）及其引发的深刻危机上，这种趋势如不从根本上加以扭转，其未来发展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挑战。2002年9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的理查德·哈斯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年会上首次阐述美国“大中东民主改造”战略，他指出：“‘9·11’事件

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与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忽视社会内部引发动荡的种种问题，只会使疏远和绝望成倍增长，并造成一种对恐怖主义的支持不断增长的社会气候。”<sup>[3]</sup>哈斯的这种“民主赤字恐怖论”核心观点为当年美《国家安全战略》所吸收，并以老调新唱的“失败国家论”(Failed States)加以标签。“失败国家论”并非新论调，早在克林顿任内就已有学者和官员提出并进行了论证。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明确将世界分成四类国家：“国际体系内国家”、“过渡国家”、“失败国家”和“无赖国家”，但将失败国家与恐怖主义挂钩则是一种新唱法。《国家安全战略》指出，“失败国家”或“衰落国家”是恐怖主义等各种极端主义滋生的温床。中东的专制统治使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被排除在全球化进程之外，广大穆斯林生活在绝望之中。而绝望成为反美主义和恐怖主义等极端主义思想的沃土。只有在中东扩展民主，改造专制政权，才能给中东带来和平、繁荣和希望，也才能削弱反美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吸引力，实现穆斯林温和化，根除恐怖主义的温床。2002年12月，美国务卿鲍威尔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正式提出名为《美国—中东伙伴关系倡议：为未来岁月构建希望》的庞大民主扩展计划，为美重塑中东社会和地区秩序确定了初步框架。2003年2月，布什总统在著名新保守主义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正式阐述扩展民主、改造中东的政策，要求解决中东的“自由鸿沟”(Freedom Gap)问题。同年11月，布什进一步将中东“民主改造战略”确定为“中东自由前瞻战略”(A Forward Strategy of Freedom in the Middle East)，指出中东专制政权先后同苏联阵营、国际恐怖主义结盟。60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宽恕和迁就中东缺乏自由的状况，这丝毫不能令西方感到安全——因为从长远看，稳定不能以自由为代价。2004年1月，布什在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大中东”概念，要求美国把新工作重点放在发展该地区的自由选举、自由市场、自由舆论和自由工会之上。同年6月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美正式提出“大中东倡议”，后改为“泛中东和北非倡议”，旨在与该地区的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加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真正合作，增加自由、民主和共同繁荣。

在以新保守派为代表的美国决策者那里，民主在曾经“例外”或者慎行的中东变得必要、可行和可能。理查德·哈斯宣称，“只要有机会，穆斯林总是拥护民主的准则，选择民主。”“穆斯林世界许多地方正在进行的活跃的改革的试验表明，民主和伊斯兰是相容的”。<sup>[4]</sup>他们认为，安全、改革与和平是实现美国中东战略相辅相成的三根支柱。只有扩展美国价值观，推动自由民主变革，从根本上改善中东社会面临的处境，美国才能赢得与恐怖主义等的“灵魂争夺战”，实现恐怖主义在中东“普遍的非法化”<sup>[5]</sup>，美国及中东盟友才有安全保障。民主也是从根本上解决阿以冲突的前提条件。只有通过民主改革，巴勒斯坦人才会有一个公正、负责、有权威的政府，才能建立“以民主、市场经济和打击恐怖主义为基础、全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sup>[6]</sup>。只有在此条件下建立的巴勒斯坦国，才能给巴勒斯坦人民带来希望，并与以色列和平共处。

美国推行的中东“大民主改造战略”是一种现实主义选择，这种布道式民主战略的道袍下露出的却是美国新帝国的武士剑柄。布什政府要凭美国的超强实力在对其霸权生死攸关、有战略需求的地区移植民主，而此战略“与现实主义的共性在于权力的中心地位”<sup>[7]</sup><sup>15</sup>。权力是值得信赖的推进民主的保障，“我们是单极强权，我们该怎么办？”的答案就是运用美国的现有优势，在“单极时代”打造出“单极世界”，建立美国新帝国。中东地区是当下对美霸权合法性和绝对国家安全构成最严重威胁的阿基里斯之踵，反美主义的激进伊斯兰势力是美最主要的敌人。因此，所谓中东的现实主义“民主改造战略”，就是以美国强权为依托、旨在改造和消融反美主义，从而为美国霸权树立合法性权威，并使世界“美国化”以建立美国新帝国的工具。

## 二、反美主义：帝国的重轭

“反美主义已成为非常有用的工具……（它）作为一种战略，似乎为所有人提供他们需要的东西……让美国来对他们生活中的一些错误负责，有助于解释世界运转方式和他们生活从未改善的原因”<sup>[8]80-81</sup>。此类说法虽为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败开脱，但也道出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深重危机。

反美主义是现代化、尤其全球化冲击下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普遍社会危机的结果。近代以来，为求自强复兴，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一直没停止过现代化的努力步伐，并曾在不同阶段仿效西方实行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但除极少数外，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从整体上说已成为现代化的落伍者和全球化的边缘者。二战后，随着中东国家相继获得民族独立，中东地区现代化进程进入了新阶段。作为后发外源型现代化的许多中东国家，盲目照搬西方发展模式或社会主义模式，没有与本国实际很好结合，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如经济发展缓慢、工农业生产落后、广大穆斯林生活困苦，甚至出现了社会转型脱序，引发了“社会结构性震荡”：人口爆炸、大规模失业、贫富分化、腐败丛生、道德沦丧、家庭和社会瓦解以及严重的认同危机。中东“传统社会和政治系统处于全方位危机之中，这些系统正在破碎和崩溃”<sup>[9]</sup>。这个充满转型挫折感的社会，一方面必会试图在“回归”伊斯兰传统中寻求慰藉和答案，形成伊斯兰复兴主义浪潮；另一方面，也注定会寻找一个外部“敌人”以宣泄怨忿和转移失败，从而产生反西方，特别是反美主义语境。

只有置入与西方长期冲突的历史背景下，才能充分理解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近代以前，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创造了远胜于欧洲的繁荣和文明，并在与基督教欧洲的冲突中处于优势地位。但近代以来，西欧的变革和扩张逆转了双方的力量对比，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逐渐沦为西欧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牺牲品。欧洲列强在中东分土裂疆、宰制河山并伴以经济掠夺、文化渗透，导致在穆斯林中形成一种主导性的、充满悲情的反西方情结。“对西方数世纪之久的霸权的记忆，伴之以继续对西方的依附，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和愤恨，很容易成为对社会失败的一种托辞和穆斯林政治中的导火线”<sup>[10]254</sup>。美国取代欧洲列强霸权地位并试图成为世界帝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承继了伊斯兰反西方主义的历史遗产，尤其美国推进的全球化进程非但未给伊斯兰世界带来繁荣与进步，反而使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并被边缘化。而且，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认同也遭到西方文化的严重冲击。因此，穆斯林眼中的全球化只是美国借以扩展霸权、实施经济控制和掠夺、宣扬西方糜烂生活方式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工具，这又进一步加剧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穆斯林的反美情绪。

与往昔列强相比，美国卷入中东事务的程度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更是无与伦比。从现实政治视角分析，中东地区的反美主义也是美国不公正中东政策的必然结果：首先，美国在阿以冲突中长期偏袒以色列，使巴勒斯坦问题久拖不决。在穆斯林看来，阿以冲突正是西方和伊斯兰世界长期冲突的延续。以色列就是在英、美等西方国家支持下在中东建国并扩张的，是西方强行植入中东心脏的一颗钉子，是西方“新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甚至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一个活标志。<sup>[11]109</sup>“正因为它重现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东与西方关系的历史图景，巴勒斯坦成了穆斯林世界跨越宗教、种族和民族界线的少数共同象征之一”<sup>[12]21</sup>。穆斯林与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休戚与共，阿拉伯国家屡次不敌以色列及巴勒斯坦人经历的苦难和屈辱不断强化广大穆斯林的绝望和愤怒。以色列成了广大穆斯林心中的“小撒旦”，而支持它的美国就必然成了“大撒旦”；其次，美国在民主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领域长期奉行双重标准以及

在海湾地区的驻军等也引起穆斯林强烈不满。美向来以良性霸权自居，高谈自由、民主和人权“不可剥夺的尊严”。但在中东却以伊斯兰反民主为由，无视穆斯林世界广泛的民主参政要求，支持中东君主制和威权政府、甚至不惜以军事政变来阻止伊斯兰运动经民选来执政。在人权方面，美国又纵容以色列长期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无视巴难民的生存权利，甚至不断制造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美还默许以色列发展和拥有核武器，却将伊斯兰国家发展和利用核技术的意愿视为严重威胁。美驻军海湾则被穆斯林视作亵圣和侵略；再次，随着单极时代的降临，美国成了唯一超级大国，拥有前所未有的力量。但美国傲慢的强权总会受到疑惧、憎恨和抵制，尤其在建立所谓“新帝国”的努力中，将不得不背负起全球，特别是中东地区反美主义的重轭。“9·11”以来，布什政府以“反恐”为名扩展霸权的努力进一步激起了全球，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怒潮。在布什政府关于“邪恶轴心”和“流氓国家”的“公示”中、在关于“要么与我们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的宣言中，都展示了美国粗暴、傲慢的形象。美国对以色列沙龙政府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种种暴行的纵容，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对无辜平民的血腥屠戮，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待丑闻，以及关塔那摩监狱“不当”对待《古兰经》事件等均极大破坏了美支持“民主”、维护“人权”的形象。伊拉克战争后，美未能找到萨达姆政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支持恐怖主义的证据，似乎也反证了广大穆斯林对美国中东政策的疑虑与抵触。因此，反恐战争开展以来，伊斯兰世界各社会阶层人民的反美主义变得更加强烈，甚至西方化的阿拉伯自由派也对美国大失所望。<sup>[13]</sup>

### 三、反美主义对中东民主化的影响

当代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始终涌动着政治参与和革新社会的渴望，以期改变自身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尴尬境地，促进本地区社会进步与经济繁荣。许多著名阿拉伯学者和分析家于2002年撰写的《阿拉伯人力发展报告》明确显示了此崭新的反省意识。二战前，阿拉伯知识分子对西欧民主体制多持赞赏态度，也希望在阿拉伯世界引进西欧式民主。可1943年叙利亚有名无实的自由选举，使阿拉伯知识分子对西欧式民主是否适合阿拉伯社会开始怀疑。阿拉伯思想界出现各种道路或倾向，其中包括社会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正确独裁主义（即所谓“开明专制”）和伊斯兰运动。20世纪七十年代后，伊斯兰运动逐渐取代其他意识形态，成为阿拉伯世界主流思潮与运动。虽然其意识形态为当今阿拉伯世界持久危机提供了简明有效的处方，即回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但伊斯兰运动主流是温和的，致力于通过政治而非暴力手段来实现其政治目标。但他们多为民主的热情鼓吹者，因为在封闭专制体系中这些人根本无法获得政权。从某种程度上看，伊斯兰运动也渗有民主因素，但美国错误的中东政策却导致伊斯兰运动的部分参与者终因无法通过合法民主途径取得政治成功而转向激进主义。“9·11”后，美国“大中东民主改造”战略一定程度上顺应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这种渴望。阿拉伯世界内部已在需要改革上取得广泛共识，民主化进程也在巴勒斯坦、伊拉克、埃及、沙特阿拉伯等国迈出了历史性步伐，并形成一股难以抗拒的潮流。但中东地区反美主义的盛行却日益成为一种阻碍和扭曲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民主化尤其是所谓美式民主化的对抗力量，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

第一，反美主义导致中东部分地区持续动荡和混乱，无法为民主化进程创造稳定的环境。美国欲在中东心脏地带伊拉克塑造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民主样板”，进而推广到整个中东地区，其在伊民主改造的成败将直接影响“大中东民主改造”战略的实现。然而，美国在伊拉克遭遇了强大的反美主义挑战。美国自恃为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解放者”，但伊拉克人却把美国为首的联军视为占领者和侵略者，并发动大规模反美游击战。各种抗美力量中，既有丧失权力的逊尼派和复

兴党成员，也有从中东各地潜入伊拉克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者，甚至为数众多的什叶派也加入了反美武装斗争行列，组成了以萨德尔为首的“麦赫迪军”。虽然后者在美国的打压和以西斯塔尼为首的主流温和派压力下暂时平息，但前者却愈演愈烈并呈长期化的趋势。这两股反美势力都不愿接受美国移植的民主，认为这是美长期霸占伊拉克的手段。他们频繁对美军和美国扶植的伊政府机构及其人员发动袭击，试图破坏社会秩序，甚至挑起伊拉克内战。伊拉克的动荡不安，大大削弱了中东地区部分民主派的改革动力。约旦《今日阿拉伯人报》主编塔希尔·阿德万一针见血指出：“伊拉克使人们可以这样说：‘忘记美国式的改革吧。’美国人不能向改革者提供任何东西来鼓励他们。”<sup>[14]</sup>

第二，反美主义盛行使美国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缺乏合意的民主派作为内应，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甚至阻止美进一步推动中东民主化进程的决心。美国以往推行所谓中东“民主例外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在中东地区缺乏合意的民主派支持者。“9·11”后，美国改变以往的中东民主战略，很大程度上出于现实主义政治考虑，希望通过对中东的民主改造，从内部彻底治理“失败国家”，从而铲除恐怖主义和反美主义土壤，确保美国绝对安全。但不可否认，美在原苏东地区扶植起亲西方自由民主派的“民主实验”，使其对冷战后全球民主形势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误判，以为历史在中东也已终结。事实上，在反美主义的语境中，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倾向于西式民主的自由民主派影响微弱，多限于知识分子群体，且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和群众基础，往往被广大穆斯林视为美国的“特洛伊木马”而在阿拉伯—伊斯兰社会中被边缘化。真正能挑战威权政府的反对派则是组织良好、有更广泛群众基础的伊斯兰主义者。但伊斯兰主义者完全无法接受基于世俗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美式民主，只接受伊斯兰民主。即使一些人暂时接受了西方民主，一旦获得政权后又恢复激进本性。他们“对改革的阐释是迈向纯粹的伊斯兰价值和政治形式，而不是走向自由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和世俗价值”。即使较为自由的伊斯兰分子也坚持认为，“真正的政教分离是无法接受的，议会制定的法律不能与伊斯兰教法相悖”<sup>[15]</sup>。由于伊斯兰运动根植于社会结构之中，具有良好的组织基础和动员能力，很容易在大选中获胜，“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大选中的获胜就是明证。美国民主化战略将面临所谓伊斯兰“挟持民主”的巨大风险，即伊斯兰主义者（包括激进派）借民主化而壮大自我，甚至出现像伊朗、塔利班那样的伊斯兰神权政体。因此，许多美国学者最近撰文要求重新审视“大中东民主改造”战略。保守的美国传统基金会中东问题专家阿里尔·科亨要求美国在推进民主战略时，必须从实质内涵、美国利益、反对单纯选举形式和防止恐怖组织合法化这四个方面系统考察，亦即，政治进程的参与者必须是多党、民主和非暴力的，必须承认少数者权利、妇女权利和以色列生存权；美国支持的必须是符合美国长期利益的民主，当选举结果危害美在中东地区生死攸关利益时必须重新权衡；选举并不等同于民主，公民社会、法治、保护少数者权利、宗教、言论和其他个人自由都是民主的重要组成。美国及其盟国要拒绝与“哈马斯”或其他民选产生的激进组织政权交往和提供外交承认、经济援助和各种形式的国际合法性。美国的中东战略必须是现实主义的，必须符合美国利益。<sup>[16]</sup>

第三，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威权政府还可借反美主义缓解美国民主化压力，从而主导和掌控当地政治变革进程。面对美国和国内改革要求，中东各国政府不能不有所回应。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没有一个统治者愿意选择政治自杀。在伊斯兰运动团体势力强大、组织良好的情况下实行公开自由的选举，其结果往往是伊斯兰政党获得更大权力，甚至上台执政。另外，在一个反美主义情绪强烈的社会中轻易屈从美国压力而推行民主化也将使政府丧失合法性。美国越表现出强行输出民主的倾向，就越容易遭到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政府的抵制。2004年3月，美国在阿盟外长会议上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受到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一致抵制，它们推出自己的改革计

划与美国方案抗衡。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还将改革进程与中东一些泛阿拉伯主义问题联系起来，抵制美国民主化压力。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于 2005 年 3 月在亚历山大会议上的发言颇具代表性。一方面，他赞同阿拉伯世界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并将主要内容放在教育现代化、经济自由化以及提高人权尤其是保护妇女权利方面；另一方面，他表示改革不应采用一种破坏阿拉伯国家稳定的方式，也不应允许激进势力操控改革进程，改革方面的国际合作机制“已经存在”，如跟欧盟签定的“巴塞罗那进程”<sup>①</sup>等。他还明确提出，为了阿拉伯改革的成功，应“同样关注”中东危机的综合解决。<sup>[17]</sup>显然，他能接受的是一种稳定基础上自主、温和、自由化的改革。而所谓的中东危机，首要就是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事实上，随着伊斯兰运动在政治上的崛起、伊拉克的混乱和什叶派上台、特别是“哈马斯”在巴勒斯坦赢得大选，反美主义使美国在中东民主改造上已出现犹疑，而中东君主制和威权主义政权则趁机抑制当地民主化进程。埃及穆巴拉克政府将地方选举推迟两年、卡塔尔议会选举计划已第三次被推迟、也门政府在总统选举前压制媒体、沙特国王拒绝选举国家协商会议的要求、叙利亚也在政府作出改革承诺后不久便开始对反对派施以严厉的限制。

第四，反美主义还制约了美“大中东民主改造”战略的路径选择。由于前苏东国家存在强大的亲西方尤其亲美反对派，再加上美国在地缘政治上压缩俄罗斯、中国战略空间的前沿，因此美在这些地区往往鼓动反对派开展街头暴动，进行自下而上的“颜色革命”，并频频得手。而在大部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由于找不到强大的亲西方反对派进行街头暴动，也担心反美激进伊斯兰势力借民主化上台，并鉴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威权政府在美反恐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美国只能缓和其推进民主化的激进立场，与亲美威权政府进行协商，选择一条自上而下、稳定基础上的渐进式改革之路，“美国不敢对中东国家逼得太紧。”<sup>[15]</sup>美国总统布什在“中东自由前瞻战略”中也不得不承认：“有效的民主制度，总是需要时间来加以完善——就像我们自己所做的那样，我们在通向包容和公正的旅程上已经走了 200 年——这使我们对其他国家处在这一旅程不同阶段的情况，能保持耐心和理解。”<sup>[18]</sup>

总之，中东反美主义对美国现实主义的“大中东民主改造”战略产生了多重影响，要改变这一窘境，美国须从根本上改变其长期推行的不公正的中东政策，积极促进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其逐渐摆脱现代化和全球化失败者和边缘者的身份，通过文明对话和相互尊重来加强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沟通，而非凭借武力和强权从外部强加给中东地区所谓的西方式民主。对此，连亲美的阿拉伯青年也表示：“毋庸置疑，我们需要帮助，但帮助我们时，还应该尊重我们，尊重真正的民主程序。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可以促进别国的人权、言论自由和其他改革，但不应以威胁方式进行，也不要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施压，而应通过积极支持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团，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来帮助这些国家。”<sup>[19]</sup>

#### [ 参考文献 ]

- [1] Bernard Lewis. Islam and Liberal Democracy : A History Overview [J]. Journal of Democracy, April 1996.
- [2] Laurie Mylroie. Promoting Democracy as a Principle of U.S. Middle East Policy [M] // Yehudah Mirsky, Matt Ahrens.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Defining the Challenge. A Washington Institute Monograph, 1993.
- [3] 美国国务院网站 [EB/OL]. <http://www.state.gov/s/p/rem/13442pf.htm>..

①巴塞罗那进程指发起于 1995 年的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其目的是促进欧盟和地中海南岸和东岸国家之间在政治改革、经济自由化和社会问题上的合作。这种对话机制主要为开展学术研讨以及政治对话提供了论坛，以推动中东在稳定中实现渐进的变革。

- [4] 理查德·N·哈斯. 促使穆斯林世界更加民主化 [J]. 国际展望, 2003 (5).
- [5] Report of President Study Group. Security, Reform and Peace: the Three Pillars of America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R].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2005.
- [6] 美国白宫网站 [EB/OL] .[2002-06-24] .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6/20020624-3.html>.
- [7] Charles Krauthammer. Democratic Realism: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a Unipolar World [M]. The AEI Press, 2004.
- [8] Barry Rubin. The Real Roots of Arab Anti-Americanism [J].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02.
- [9] James A. Bill, Rebecca Bill Chavez. The Politics of Incohere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J].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Autumn 2002.
- [10] J·L·埃斯波西托. 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 [M]. 东方晓,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11] 高祖贵.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5.
- [12] Michael Scott Doran. Palestine, Iraq, and American Strategy [J].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3.
- [13] Marc Lynch. Taking Arabs Seriously [J].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3.
- [14]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 2006-04-10.
- [15] 卡内基中文网 [EB/OL] . [2007-09-05].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programs/china/chinese/Research/PoliticalSocialDev/GreaterMiddleEast.cfm>.
- [16] 美国传统基金会网 [EB/OL] . [2006-01-01].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MiddleEast/wm983.cfm>.
- [17]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网 [EB/OL] . [2007-09-02].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rint.php>.
- [18] 美国白宫网站 [EB/OL] . [2003-11-06] .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2003/11/20031106-2.html>.
- [19]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 .2003-12-15.

## The Middle Eastern Democrat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Anti-Americanism

WANG Jian WANG Shuming

**Abstract** USA's *Middle Eastern Reformation* strategy is based on realist consideration of anti-terrorism and state security, while Islamic—Arab world's anti-Americanism originates from negative effects of moder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besides USA's unjust Middle East strategy. The practice of Middle Eastern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in the context of anti-Americanism is bound to face with obstacles and distortion. Anti-Americanism not only leads to the absence of democratization process's stable environment in the Middle East to prevent USA's determination, but also confines USA's concrete route choices of *Middle Eastern Reformation* strategy as Arab authoritative governments' balance method to resist USA's democratization pressure.

**Key Words** Anti-Americanism; Middle East; Democratization

(责任编辑: 马丽蓉)